

· 专题研究 ·

《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新证^{*}

程苏东

[摘要] 在《春秋繁露》所收与“五行”相关的九篇文本中,除《五行相生》《五行相胜》基本可定为董仲舒所作,《五行变救》尚难考定以外,其他六篇都不同程度地与《管子·四时》《淮南子·时则训》《淮南子·天文训》、董仲舒《孝经解》以及时代晚于董氏的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等存在互见关系。通过对这些互见文本的比读,可发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包括董子原作、后人续作及二次续作三个层面,展现了后儒将董子“五行”生胜思想与秦汉时月令思想、《洪范》五行学乃至《孝经》学思想进行融合,构建新的“五行”学体系的尝试。这些衍生文本来源驳杂,常无法消除多源论述逻辑之间的抵牾,显露出“文本嫁接”的痕迹,其文本生成方式在早期著述传统中具有代表性,值得研究者关注。

[关键词] 《春秋繁露》;董仲舒;五行;《洪范五行传论》;刘向

[中图分类号] K2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16)07-0027-14

《春秋繁露》是汉代经学史、学术史研究的基础文献,但由于该书晚出,其成书过程及其所收诸篇的作者认定,历来是学界争论的问题。即以与“五行”相关的诸篇而言,自20世纪中叶日本学者揭橥此问题后,聚讼纷纭,歧见迭出,然反思其研究方法,除用其中数篇与《淮南子》《管子》中少量互见文献对勘以外,多循思想史之研究理路,从董子“五行”思想入手,考论《春秋繁露》所收诸篇是否符合董子思想。这种研究方法因诸家对董子思想的认识不同,故颇存争议。本文将以文本研究为主要方法,通过对《管子》《淮南子》《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等著作中与《春秋繁露》互见之文的分析以及对隋代萧吉《五行大义》所引古本《春秋繁露》佚文、刘炫《孝经述议》所引董仲舒《孝经解》与今本《春秋繁露》的比对,系统梳理“五行”诸篇的文献学关系,进而探讨诸篇的形成过程。我们也希望以这一问题的研究为个案,引起学界方家对抄本时代文本形成过程复杂性问题的关注。

一 学术史的回顾与方法论反思

《春秋繁露》一书之见录,始于《隋书·经籍志》^①,此前《汉书·艺文志》中仅著录“《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董仲舒》百二十三篇”^②,并无《春秋繁露》一书之名,而《汉书·董仲舒传》称其“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③,亦不以《春秋繁露》为其著作之总名。《汉书》的这一记载成为后来学者质疑《春秋繁露》一书真伪问题的引子,据笔者所见,北宋《崇文总目》最早提出这一问题:

其书尽八十二篇,义引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间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竹林》题篇,疑后人取而附著云^④。

《崇文总目》认为《春秋繁露》之辞义宏博,当渊源有自,非近人可伪,只是《汉书》称董仲舒之书“百二

*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汉代《洪范》五行学研究”(14CZX022)。

① 《隋书·经籍志》,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930页。鲁惟一先生认为《春秋繁露》之名始见于阮孝绪之《七录》,其所据为晋《西京杂记》中已有“春秋繁露词”之名,其说可参。见鲁惟一编,李学勤等译:《中国古代典籍导读》,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81页。

② 《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14、1727页。

③ 《汉书·董仲舒传》,第2526页。

④ 王尧臣等:《崇文总目》卷一,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3页。

十三篇”，如今仅存八十二篇，可知“其间篇第亡舛”。又据《汉书·董仲舒传》，《玉杯》《蕃露》乃各篇之独立题名，而今本《春秋繁露》既以“繁露”为总名，而其中又有以《玉杯》为篇名者，恐为后人据《董仲舒传》“取而附著”也。由此可见，《崇文总目》虽然对《春秋繁露》一书的篇第、篇题等存疑，但对于这部书“非出近世”的可信度，还是基本认可的。这种审慎存疑的态度为南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等著作所继承^①。

而真正对《春秋繁露》一书的真伪问题展开全面质疑的，是南宋学者程大昌，他在《秘书省书繁露后》一文中指出，其所见绍兴间董某所进本《春秋繁露》有可疑者凡三处：其一，“辞意浅薄”，与《汉书》所载其天人三策“不相伦比”；其二，以《竹林》《玉杯》等为篇题，而以《春秋繁露》为全书总名，与《汉书·董仲舒传》所载董氏著述不合；其三，《太平寰宇记》《通典》所载《春秋繁露》之佚文不见于董氏所进本《春秋繁露》^②。这三点中，除第二点袭自《崇文总目》以外，皆为程大昌之创见，特别是第三点，以文献为据，颇令人信服，故其说影响巨大，陈振孙、黄震等皆推衍其说^③。尤其是黄震，以《春秋繁露》中灾异、求雨诸说与董氏“纯儒”形象不符，完全否定了《春秋繁露》的可信性。《春秋繁露》伪书之名，由此而生。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程大昌虽然认为其所见的《春秋繁露》系伪书，但并不认为《春秋繁露》本身是后人伪造的，他在《秘书省书繁露后》的补记中说：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达监，馆本有《春秋繁露》，既尝书所见于卷末，而正定其为非古矣，后又因读《太平御览》，凡其部汇列叙古《春秋繁露》语特多，如曰“禾实于野，粟缺于仓”，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干土则五谷伤，土干金则五谷不成。”“张汤欲以鹜当皂祠祀宗庙，仲舒曰：鹜非皂，皂非鹜，愚以为不可。”又曰：“以赤统者帙尚赤。”诸如此类，亦皆附物著理，无凭虚发语者，然后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谬也。《御览》太平兴国间编辑，此时《春秋繁露》之书尚存，今遂逸不传，可叹也已^④。

程氏认为《太平御览》所引《春秋繁露》之语皆“附物著理，无凭虚发语者”，故认为太平兴国间所流传的《春秋繁露》仍系董仲舒所著之真本，惜乎其亡佚不传而已。

较程氏稍晚，楼钥乃致力于《春秋繁露》版本的搜集，并先后获得里中写本、京师刻本、萍乡翻刻罗氏兰堂本（三十七篇）和潘景宪子弟访获本（八十二篇）四种。其中三十七篇本与八十二篇本均较程大昌所见董氏所进本完备，尤其是后者，《太平御览》等诸书所引《春秋繁露》佚文大多可以查见^⑤，程大昌质疑《春秋繁露》的文献学依据再难成立。楼钥由是而言：“则其为仲舒所著无疑，且其文词亦非后世所能到也。”^⑥楼氏乃据此本参校诸本而刻印之，明清以来流传之《春秋繁露》，多以此本为底本^⑦，而楼氏关于《春秋繁露》的论断也为王鏊等明清学者所认可^⑧。就笔者所见，明清学者大多对《春秋繁露》的真伪持审慎的肯定态度，这其中四库馆臣的论断颇具代表性：

今观其文，虽未必全出仲舒，然中多根极理要之言，非后人所能依托也^⑨。

然而，随着《春秋繁露》研究的国际化，到20世纪中叶，日本学术界对《春秋繁露》颇多关注，此书的真伪问题再次成为学者争论的焦点。1959年，庆松光雄发表了《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一文^⑩，

①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一下：“史称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闾举》、《玉杯》、《春秋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余万言，传于后世。今溢而为八十二篇，又通名《春秋繁露》，皆未详。”（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105页）

② 程大昌：《秘书省书繁露后》，祝穆编：《事文类聚》别集卷二《儒学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陈振孙著录云：“非当时本书也……况《通典》、《御览》所引，皆今书所无者，尤可疑也。”（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55页）黄震：《黄氏日抄》卷五六《读诸子·春秋繁露》案语云：“愚按今书，惟《对胶西王越大夫之问》辞约义精而具在本传，余多烦猥，甚至于理不驯者有之。”（元后至元刊本）

④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一八二《经籍九》，中华书局1986年影印本，第1566页下栏～1567页上栏。

⑤ 据田则岳统计，《太平御览》引《春秋繁露》共50处，其中不见于楼钥本者仅4处。参见田则岳：《董仲舒的思想体系：学术渊源与其对汉代学术之影响》（博士学位论文）（Tain Tzey-yueh, *Tung Chung-shu's System of Thought: Its Sources and its Influences on Han Scholarship*），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1974年，第57页。

⑥ 楼钥：《攻媿集》卷七七《跋春秋繁露》，乾隆武英殿聚珍本。

⑦ 可参崔涛：《现存〈春秋繁露〉单行本版本考略》，《华中科技大学学报》2004年第3期，第95～98页。

⑧ 王鏊：《震泽长语》卷上“《春秋繁露》十卷世多以为伪书”条，清指海本。

⑨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清乾隆武英殿本。

⑩ 庆松光雄：《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金泽大学法文学部论集（哲学文学）》第6号（1959），第25～46页。

将《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具体到“五行”诸篇,也就是《五行对》《五行之义》《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五行顺逆》《治水五行》《治乱五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等九篇文献上。庆松氏的主要论据是,《汉书·五行志》记载了大量董仲舒的灾异说解,然而没有一条是以“五行”说灾异的,足见董仲舒并无“五行”学说,故而《春秋繁露》所见“五行”诸篇自然也不会是董氏的著作。

自庆松先生论文发表后,“五行”诸篇的真伪问题遂引起了中日学术界的反复讨论,田中麻纱巳^①、边士名朝邦、池田知久、斋木哲郎等先后著文对庆松的看法进行正反两方面的论证。关于这一学术史,可参邓红《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与关村博道《日本学者关于〈春秋繁露〉的论争评析》的评介^②。

除日本学者外,台湾学者对《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同样有所关注,而其关心的重点同样也是“五行”诸篇。事实上,早在1931年,黄云眉先生即在其《古今伪书考补证》一书中提出《春秋繁露》“不仅书名伪而书亦伪矣”的观点,将姚际恒原书中“书非伪而书名伪”的结论更推进了一步,但其所举理由不外宋人所谓董氏“纯儒”之说^③,因此在当时影响并不大。1969年,戴君仁先生发表《董仲舒不说五行考》一文,提出了与庆松光雄同样的问题,将“五行”诸篇定为伪作^④。随后,徐复观先生在《两汉思想史》中即对庆松、戴君仁的论点进行了反驳。他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西汉初期,“阴阳”与“五行”尚未融合,汉宣帝以后,此两者才逐渐融合,《春秋繁露》中“五行”诸篇所论“阴阳”与“五行”皆分为二途,“所以《春秋繁露》中阴阳五行的关系,仍在演进之中,这是绝不能推后或推前的”^⑤,《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即便并非全出自董仲舒本人,也可以视作其弟子、学派著作的合集。李威熊先生《董仲舒与西汉学术》一书亦认为在没有直接证据的情况下,不可妄言《春秋繁露》之伪^⑥。

此外,欧美学者对于《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也颇多论述,Gary Arbuckle, Sarah A. Queen(桂思卓)、Michael Loewe(鲁惟一)等均在其论著中论及这一问题^⑦。他们的具体观点及论述角度虽有不同,但基本上都认为《春秋繁露》中的不少篇章,包括“五行”篇在内,难以认定为董仲舒的作品。至于 Tain Tzey-yueh、Davidson Steven 等则赞同徐复观的观点,认为《春秋繁露》的思想具有内在的系统性和一致性,并且与《汉书》所载董氏《天人三策》中体现的思想相吻合,应当将其视作董氏的作品。

在大陆学界,关于《春秋繁露》真伪的讨论并不多见,大多数学者倾向于接受四库馆臣的意见,认为此书虽经后人重新编定,但仍基本可视为董仲舒的作品^⑧,直到最近江新在《〈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真伪考》一文中重新梳理了“五行”诸篇真伪问题的学术史,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⑨。

从方法论上来看,除了早期的《崇文总目》以及程大昌是根据篇题、佚文等文献学依据质疑《春秋繁露》的真伪以外,自黄震以来,大多数学者论证《春秋繁露》的真伪问题,都是以《春秋繁露》所反映的董仲舒思想是否与《汉书》所载或者汉代思想史相符作为衡量标准的。这种研究方法固然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无疑也有很大的风险,这就是论述者必须假设董仲舒的思想是始终保持一致的,同时论述者还必须保证自己对《春秋繁露》的理解是完全忠实于原文的。但显然,这两点只能是一种理想状态的假设而已,在实际的研究过程中,论述者个人的学术背景无疑会影响到他对《春秋繁露》文本真伪的判

- ① 田中麻纱巳撰,秦祺、邓红译:《关于〈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考察》,《衡水师学报》2015年第5期,第14页(原刊1969年《集刊东洋学》22号)。
- ② 邓红:《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年版,第51~57页;关村博道:《日本学者关于〈春秋繁露〉的论争评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第238页。
- ③ 黄云眉:《古今伪书考补证》,山东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00~303页。
- ④ 戴君仁:《董仲舒不说五行考》,《“中央”图书馆馆刊》(台北)第2期(1968),第9~19页。
- ⑤ 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95页。
- ⑥ 李威熊:《董仲舒与西汉学术》,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78年版,第7页。
- ⑦ 桂思卓著,朱腾译:《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5页;鲁惟一:《董仲舒:儒学传统与〈春秋繁露〉》(Michael Loewe, *Dong Zhongshu, a 'Confucian' Heritage and the CHUNQIU FANLU*),莱顿:博睿出版社2011年版,第212页。
- ⑧ 可参黄朴民:《〈春秋繁露〉的真伪与体例辨析》,《齐鲁学刊》1990年第2期,第25~27页;钟肇鹏:《春秋繁露考辨》,见氏著:《春秋繁露校释》(校补本),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196页。
- ⑨ 江新:《〈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真伪考》,《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4期,第43页。

定,以至于一些同样的事实判断,可以被赋予完全不同的价值判断^①。学术界对于这种研究方法已经有所诟病,例如邓红在谈及日本学界关于《春秋繁露》真伪的讨论时即指出:“说《春秋繁露》的某一部分是伪作的议论在日本学界一直没有停过,但因为缺乏确切证据,只能在文义上进行推断。以田中为代表的这一部分学者采用的,往往是先认定《春秋繁露》肯定有伪作,然后再去寻找的先入为主法。”^②其实这种以“思想理路”论真伪的研究方法并不仅仅存在于日本学界,它甚至可以说是宋代以来《春秋繁露》真伪问题研究的一种传统方法。

而在这一背景之下,江新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则值得注意。他注意到《春秋繁露》与《汉书·五行志》之间的互见关系,于是以此为据,认为《春秋繁露》中《五行五事》等诸篇并非董仲舒的作品,而是出于刘向。虽然他利用的文献资料尚不够完备,结论也略显草率,但这种根植于文本的方法与思路,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因此,本文亦将以文献学的研究为主要方法,通过对《管子》《淮南子》《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等著作中与《春秋繁露》互见之文的分析以及对隋代萧吉《五行大义》所引《春秋繁露》佚文与今本《春秋繁露》的比对,系统梳理“五行”诸篇的文献学关系。当然,围绕“五行”诸篇思想的研究已经有了丰富的成果,非常值得我们借鉴,因此,我们将努力结合文献学与思想史分析两种研究方法,探讨“五行”诸篇的真伪及作者问题,希望我们的尝试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有所推进。

二 问题的提出:《五行顺逆》与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互见关系

关于“五行”诸篇真伪问题的讨论,此前通常存在于思想史的论域下,庆松光雄、戴君仁认为董氏论“阴阳”而不说“五行”,因此“五行”诸篇不当出于董氏;而徐复观等认为董氏兼论“阴阳”“五行”,故“五行”诸篇宜出自董生^③。但争论双方都未举出实质性的文本依据来证实《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的真伪,因此,此一论题能否成立,终究缺乏文本的实证。就本文而言,我们讨论“五行”诸篇的真伪问题,立论的基础乃在其与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互见关系上。

熟悉汉代五行学的读者在读到《春秋繁露·五行顺逆》篇的时候,很容易产生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种感觉首先引导我们注意到《五行顺逆》(下文简称《顺逆》)篇与班固《汉书·五行志》(下文简称《汉志》)之间的呼应关系:

表 1 《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与《汉书·五行志》之互见关系表

| | 《五行顺逆》 ^④ | 《汉书·五行志》 |
|---|--|---|
| 木 | 如人君出入不时,走狗试马,驰骋不反宫室,好淫乐,饮酒沈湎,纵恣不顾政治,事多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财,民病疥搔温体,足胼痛,咎及于木,则茂木枯槁,工匠之轮多伤败。 | 传曰:“田猎不宿,饮食不享,出入不节,夺民农时,及有奸谋,则木不曲直。”说曰:“若乃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湎,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乃木为变怪,是为木不曲直。” |
| 火 | 如人君惑于谗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辜,逐忠臣,以妾为妻,弃法令,妇妾为政,赐予不当…… | 传曰:“弃法律,逐功臣,杀太子,以妾为妻,则火不炎上。” |
| 土 | 如人君好淫佚,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为台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镂…… | 传曰:“治宫室,饰台榭,内淫乱,犯亲戚,侮父兄,则稼穡不成。” |
| 金 | 如人君好战,侵陵诸侯,贪城邑之赂,轻百姓之命…… | 传曰:“好战攻,轻百姓,饰城郭,侵边境,则金不从革。” |
| 水 | 如人君简宗庙,不禘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 | 传曰:“简宗庙,不禘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

以“木”行部分为例,《顺逆》篇之“出入不时”,《汉志·传曰》作“出入不节”;《顺逆》“走狗试马,驰

① 鲁惟一即指出:“他(笔者注:戴维森)还极力认为文中的自相矛盾与其他缺陷的存在其本身就有利于说明它保持了原貌,而不利于说明那种能使人们预想到是编造者所为的那种更为圆通的效果。”(鲁惟一编,李学勤等译:《中国古代典籍导读》,第86页)

② 邓红:《董仲舒的春秋公羊学》,第52页。

③ 庆松光雄:《春秋繁露五行诸篇伪作考》,第25~46页;戴君仁:《董仲舒不说五行考》,第9~19页;徐复观:《两汉思想史》第二卷,第195页。

④ 表格中《春秋繁露》引文均出自苏舆:《春秋繁露义证》(中华书局1992年版),下不复注。

骋不反宫室”，对应《汉志·说曰》之“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顺逆》“饮酒沈琨”，对应《汉志》之“饮食沈酒”；《顺逆》“不顾政治，事多发役，以夺民时”，对应《汉志》“不顾法度，妄兴繇役，以夺民时”；《顺逆》“作谋增税，以夺民财”则对应《汉志》“作为奸诈，以伤民财”；其后《顺逆》中“民病”云云不见于《汉志》，至“工匠之轮多伤败”，则又对应《汉志》“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显然，《顺逆》与《汉志·木不曲直》的“传曰”部分有相关性，尤其与其“说曰”部分有文本层面的互见关系。

但是，从整体上看，《顺逆》与《汉志》的互文关系是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的，主要在木行中表现得比较明显，在其他四行中，则相对较弱。我们知道，《汉志》所引“传曰”实为汉初夏侯始昌所传《洪范五行传》（下文简称《五行传》），至于“说曰”的部分，则以刘向在成帝时期所撰的解《传》之作——《洪范五行传论》（下文简称《传论》）为基础^①，并经班固增删而成。而随着我们进一步辑佚《南齐书·五行志》（下文简称《南齐志》）《隋书·五行志》（下文简称《隋志》）等所引刘向《传论》佚文，乃发现《顺逆》与刘向《传论》之间的互见关系，远超过其与《汉志》之间的重合度：

表2 《春秋繁露·五行顺逆》与刘向《洪范五行传论》之互见关系表

| | 《五行顺逆》 | 《洪范五行传论》 |
|---|--|---|
| 木 |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进经术之士。挺群禁，出轻系，去稽留，除桎梏，开门闾，通障塞，恩及草木，则树木华美，而朱草生，恩及鳞虫，则鱼大为，鳙鲸不见，群龙下。如人君出入不时，走狗试马，驰骋不反宫室，好淫乐，饮酒沈琨，纵恣不顾政治，事多发役，以夺民时，作谋增税，以夺民财，民病疥搔温体，足胠痛，咎及于木，则茂木枯槁，工匠之轮多伤败。 | 《木传》曰：东方，《易经》地上之木为《观》，故木于人，威仪容貌也。木者，春生气之始，农之本也。无夺农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无贪欲之谋，则木气从。如人君失威仪，逆木行，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沈酒，不顾礼制，出入无度，多发繇役，以夺民时，作为奸诈，以夺民财，则木失其性矣。盖以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故曰木不曲直 ^② 。 如人君违时令，失威仪，田猎驰骋，不反宫室，饮食沉酒，不顾礼制，纵欲恣睢，出入无度，多繇役以夺人时，增赋税以夺人财，则木不曲直 ^③ 。 |
| 火 | 如人君惑于谗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辜，逐忠臣，以妾为妻，弃法令，妇妾为政，赐予不当…… | 人君疑惑，弃法律，不诛谗邪，则谗口行，内间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逐功臣，以妾为妻，则火失其性 ^④ 。 |
| 土 | 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加亲戚之恩……如人君好淫佚，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欺罔百姓，大为台榭，五色成光，雕文刻镂，则民病心腹宛黄，舌烂痛，咎及于土，则五谷不成。 | 故明王贤君修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加亲戚之恩，敬父兄之礼，则中气和。人君肆心纵意，大为宫室，高为台榭，雕文刻镂，以疲人力，淫佚无别，妻妾过度，犯亲戚，侮父兄，中气乱，则稼穡不成 ^⑤ 。 |
| 金 | 金者秋，杀气之始也。建立旗鼓，杖把旄钺，以诛贼残，禁暴虐……如人君好战，侵陵诸侯，贪城邑之赂，轻百姓之命…… | 金者，西方，万物既成，杀气之始也。其于王事，兵戎战伐之道也。王者兴师动众，建立旗鼓，杖旄把钺，以诛残贼，止暴乱……人君乐侵陵，好攻战，贪城邑，轻百姓之命，人民不安，内外骚动，则金失其性 ^⑥ 。 如人君乐侵陵，好攻战，贪城邑之赂，以轻百姓之命，人皆不安，外内骚动，则金不从革 ^⑦ 。 |
| 水 | 水者冬，藏，至阴也，宗庙祭祀之始，敬四时之祭，禘祫昭穆之序，天子祭天，诸侯祭土，闭门闾，大搜索，断刑罚，执当罪，饬关梁，禁外徙，恩及于水，则醴泉出，恩及介虫，则鼃鼃大为，灵龟出。如人君简宗庙，不禘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 | 水者，北方之藏气，至阴也。宗庙者，祭祀之象也。故天子亲耕以供粢盛，王后亲蚕以供祭服，敬之至也……如人君简宗庙，不禘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⑧ 。 |

在论述《顺逆》与刘向《传论》的关系之前，我们需要首先讨论《顺逆》与《汉书·五行志》《南齐书·五行志》《隋书·五行志》之间的关系。从上面两表可以看出，《顺逆》虽然与《汉志》《南齐志》《隋志》的引文存在互见关系，但并不与其中任何一种呈现出特别密切的关联，例如木行部分的“木者，春，生之

① 《汉书》载：“向见《尚书·洪范》，箕子为武王陈五行阴阳休咎之应。向乃集合上古以来历春秋六国至秦汉符瑞灾异之记，推迹行事，连传祸福，著其占验，比类相从，各有条目，凡十一篇，号曰《洪范五行传论》，奏之。”（《汉书·楚元王传》，第1950页）

②④⑥ 《南齐书·五行志》，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369、374、380页。

③⑤⑦⑧ 《隋书·五行志》，第618、623、619、621页。

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仅见于《南齐书·五行志》;土行部分的“循宫室之制,谨夫妇之别,加亲戚之恩”、金行部分的“贪城邑之赂”等仅见于《隋书·五行志》。经笔者考查,刘向《传论》自产生后,流传的情况十分复杂,加之历代史臣抄撮《传论》各有详略增删,因此造成三《志》之间存在严重的异文现象。而《顺逆》与此三《志》各有互见、异同,可见与《顺逆》存在直接传抄关系的,并非《汉志》《南齐志》或者《隋志》,而是它们共同的史料来源:刘向《洪范五行传论》。

通过以上两表的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较之与《洪范五行传》的呼应关系,《顺逆》篇与《洪范五行传论》之间的传抄关系显然更为密切,几乎所有与《五行传》的呼应关系,都可以通过其与《传论》之间的传抄关系而得到合理的呈现。因此,我们可以说,《顺逆》篇与《五行传》之间的呼应关系,是通过其与《五行传论》之间的传抄关系而实现的——既然《传论》本身就是以《五行传》为基础的衍生文献,则与《传论》存在传抄关系的《顺逆》自然也就与《五行传》存在呼应关系了。

那么《顺逆》与《传论》之间的传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从各书所引《传论》的佚文来看,刘向对于《五行传》的解说是颇具系统性的,以上表所引“木”行部分为例,刘向首先解释“木”行的基本内涵,随后论逆木行之灾异,自“田猎驰骋”始,句句与《五行传》相对应,而最后“盖以工匠之为轮矢者多伤败”一句,则解释“木不曲直”的具体含义,结构严整,辞意相连,语气完足。而与《传论》相比,《顺逆》与《五行传》之关系则较为疏离,例如《五行传》中论及的核心问题:“木不曲直”即未在此段中出现,而此段所论灾异除“咎及于木”以外,还包括鳞虫和人民的身体。可见《五行传》只是《顺逆》的思想来源之一,其将木行与鳞虫相联系,显然是受到传统月令思想的影响。总之,与刘向《传论》鲜明的“解传”体例不同,《顺逆》篇实为杂合《五行传》与传统月令两种思想而成的一篇论著。我们很难想象,刘向在说解并不算古奥的《五行传》时,刻意从这篇思想驳杂的文献中寻章摘句,再完全裁汰其与《五行传》思想无涉的词句。相反,合理的假设是,《顺逆》的作者是在见到刘向《传论》后,对其五行休咎之说颇为赞赏,但觉得尚不足发“五行顺逆”之说,于是在此基础上进行发挥敷衍,并将月令思想中的一些灾异对应关系加诸其中,例如《顺逆》“木”行部分“挺群禁”云云,又见于《淮南子·天文训》,表明除刘向《传论》以外,《顺逆》篇还有其他的文本来源。

总之,《五行顺逆》可以视作刘向《洪范五行传论》的衍生文献,是在后者的基础上加以增删、改写而成的。其产生年代自然要在《传论》之后,而《传论》之成书在西汉成帝后期,距董仲舒辞世已近百年,故此《顺逆》篇不可能为董仲舒所作。

三 《五行顺逆》篇与《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的关系问题

《顺逆》既非董子所作,为何又出现在《春秋繁露》当中呢?其与董子思想有何关系呢?要了解这一问题,可借其与《五行相生》(下文简称《相生》)《五行相胜》(下文简称《相胜》)两篇之文本关系得以揭示。

就《相生》《相胜》两篇而言,其同构性、互补性关系十分清晰。例如在《相生》篇的开头,即言“五行者,五官也,比相生而间相胜也”^①,明确指出其论“五行—五官”乃兼有相生、相胜二义,而在这两篇中,无论是五官的具体所指,还是五行与五官的对应关系,特别是不见于其他文献的“司营”一职以及各举五贤、五恶以见义的论述思路,都可谓完全一致。两者可以被视作同构互补的一个文献集合体。

那么,《相生》《相胜》篇与《顺逆》之间的关系如何呢?我们之所以提出这一问题,主要是基于《顺逆》篇与《相生》篇之间的一些互见关系:

^①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62页。

表3 《五行顺逆》与《五行相生》之互见关系表

| 例次 | 《五行顺逆》 | 《五行相生》 |
|----|--|--|
| 1 | 木者,春,生之性,农之本也。劝农事,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行什一之税,进经术之士。挺群禁,出轻系,去稽留,除桎梏,开门闾,通障塞…… | 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进经术之士,道之以帝王之路,将顺其美,匡掇其恶。 |
| 2 | 火者夏,成长,本朝也。举贤良,进茂才,官得其能,任得其力…… | 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进贤圣之士。 |
| 3 | 土者夏中,成熟百谷,君之官。 | 中央者土,君官也。 |
| 4 | 如人君简宗庙,不禘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 | 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 |

《顺逆》思想来源驳杂,除刘向《传论》以外,“挺群禁”以下数句,又见于《淮南子》的《天文训》与《时则训》,在《礼记·月令》中也有所反映。至于未见于表中的五行“民病”部分,则与《洪范五行传》或离或合,凡此都应源于当时的时月令文献。而除此两者之外,仍有一些词句的来源值得注意。以上表部分文字为例:

例1,《顺逆》篇与《相生》篇的木行部分同样出现了“进经术之士”。本来在汉代的文献中,出现这样的短句重合并不值得惊讶,但据《顺逆》文脉,木行之本在“农”,因此,“无夺民时,使民岁不过三日”是指应保证农民的劳作时间,“行什一之税”是通过减轻农民的税务负担而调动其劳动积极性,“挺群禁”云云,是指增加农耕人口数量,“通障塞”则是改善农田水利设施。总之,此段数句虽然有的直接录自《传论》,有的是作者的敷衍或录自他处,但都紧紧围绕“劝农事”这个主题展开,文意连贯,而“进经术之士”一句在这一段中则显得非常突兀,究竟“劝农”与“进经术之士”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至于《五行相生》篇中出现的“进经术之士”一句就显得合理多了。按照《相生》篇的思路,五行与五官相对应,五官又与五常相对应,因此其论五行生胜、五官职守,最终往往在五常之德上落脚。以司农为例,顾名思义,其所职掌当在于农业,但《相生》篇论其职掌,自“进经术之士”至“匡掇其恶”,皆就“尚仁”之德而言。其后“知地形肥磽美恶”云云,才是就一般官僚制度中的“司农”之官而言其职守。《相生》篇论五官职守的这种叠加模式,在此后司马、司营、司徒、司寇诸官的论述中仍有不同程度的体现。“进经术之士”一句虽互见于《顺逆》《相生》两篇之中,但显然与《相生》篇的联系更为合理、密切,《顺逆》篇中的此句很有可能采自《相生》篇。

例2,关于“本朝”,从秦汉文献用例来看,指在中央政府任职的中高级官员。《相生》篇所举司农等“五官”皆可称“本朝”,但该篇以司马之职守为“进贤圣之士”,有充实“本朝”之意,故仅以“本朝”指代“司马”,并使之与“火”行、夏时对应。在这一体系中,“五官”之一的“司马”是最关键的一环。但《顺逆》篇灾异体系中并无“五官”一环,故其径言“火者夏,成长,本朝也”,颇令人费解。苏舆在“成长”下注:“下疑尚有脱字。”^①就是未能理解以“本朝”与“火”相对应的奇特逻辑。因此,“本朝”一词虽然两见于《相生》与《顺逆》,但其在《相生》中是合理的组成部分,而在《顺逆》中则显得突兀、怪异,可以认定,《顺逆》篇以“本朝”对应火行,当是援据《相生》篇而成。

例3,“君之官”,或言“君官”,字面意思可理解为“君主这个官”,此语初看颇为怪异。《说文》:“官,史,事君也。”^②一般而言,“官”与“君”相对,“君之官”一说,实令人费解。但正如彭林先生在《〈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一书中所论,战国以来的儒家与法家,在君权论方面存在一定差异: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认为君主地位不受任何约束,包括“法”在内的一切国家机器都不能限制君主的权力;而以孟、荀为代表的儒家则反对这种“绝对君权论”。彭林举出《荀子》中“全道德,致隆高,纂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顺比从服,天王之事也。故……天下不一,诸侯俗反,则天王非其人也”等例证,说明在儒家看来,“天王亦居其一,他不仅要与其他官员一样负有社会责任,而且要与其他官员

①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73页。

② 许慎:《说文解字》卷一四上,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477页。

一样接受考核”^①，这是战国时期儒士特有的政治理念。事实上，《孟子》中“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②之说，将“天子”置入爵制之中，也反映了将“君”纳入国家职官体系之中的尝试。

而董子在此正是秉承孟、荀传统，将“君”与司农、司马、司徒、司寇相并，称为“君之官”或“君官”，在《相胜》所论五行相胜、五官相克理论中，更提出“夫土者，君之官也，君大奢侈，过度失礼，民叛矣，其民叛，其君穷矣，故曰木胜土”^③。在《相胜》木行部分，董子曾指出：“夫木者农也，农者民也。”^④因此，“木胜土”，实质上就是暗示“民胜君”，这种君、民关系的解释，充分体现了儒家的重民观念，也是汉儒限制绝对君权的一种理论尝试。

不过，汉儒身处帝国时代，君主独一无二的权威已不容挑战，且照五行生胜理论，五官有相生相克之义，例如木生火，对应司农生司马，意谓国家只有在先解决温饱问题后，才能进一步讨论选贤任能的问题。那么，依照火生土之义，“君之官”当由“司马”所生，但这显然无法被接受。因此，为了处理这一困境，董子在“君之官”部分单独设计了一个附赘的“其相司营”，在论五行相生时，以司马生司营，而以司营为“天下既宁，以安君官者”^⑤，从而将“司营”与“君官”联为一体，皆系于中央土行之下。总之，《相生》篇中的“君官”在董氏五行生胜体系中具有关键性的地位。

但在《顺逆》篇中，土行部分的论述仍以刘向《传论》为主体，只是在起首部分出现“君之官”一词，不仅于前后文缺少呼应，而且不符合《顺逆》篇的内在体系——《顺逆》五行体系以刘向《传论》为基础，后者源出《洪范五行传》。与董氏“五行一五官”说仅将土行对应人君不同，《五行传》于五行皆与人君对应，如《顺逆》篇木行下言“如人君出入不时”，火行下言“如人君惑于谗邪”等^⑥，《顺逆》篇于土行部分独言“君之官”，似仅以土行与人君对应，此实与其自有之体系相悖。这里的“君之官”，不是基于其文本内部理路而出现的一个概念，只能是据《相生》《相胜》篇而袭用之辞。

例 4. 关于“执法”，《顺逆》篇关于水行咎由的论述主要取自《洪范五行传》：

表 4 《五行顺逆》与《洪范五行传》之互见关系表

| 《五行顺逆》 | 《洪范五行传》 ^⑦ |
|---------------------------|---------------------------|
| 如人君简宗庙，不禘祀，废祭祀，执法不顺，逆天时…… | 传曰：简宗庙，不禘祠，废祭祀，逆天时，则水不润下。 |

比对上表，“执法不顺”是《顺逆》篇仅有的溢出《五行传》原文的词句，而它与“简宗庙”等也不存在逻辑关联。最重要的是，按照《五行传》的思想体系，与“执法”相关的五行应当是火行^⑧，作为刘向《传论》的衍生文献，《顺逆》篇在火行部分也谈及了执法公正的问题：

如人君惑于谗邪，内离骨肉，外疏忠臣，至杀世子，诛杀不辜，逐忠臣，以妾为妻，弃法令，妇妾为政，赐予不当……^⑨

在这样的背景下，《顺逆》篇水行部分再次言及“执法不顺”，显然有自乱体系、前后重复之弊。

至于《相生》篇，水行对应之官为司寇，正是执法之官，故其言“执法”，实理所当然。《顺逆》篇中“执法不顺”一句，恐怕也是据《相生》篇而成。

总此，《顺逆》篇虽然在整体结构上取自刘向《传论》，但在诸行休咎的具体论述中，却吸纳了《相生》《相胜》篇的五行对应体系以及传统的月令文献，呈现出“文本嫁接”的特点。由于《相生》《相胜》篇、刘向《传论》以及时月令文献原是各自独立的思想体系，它们对于五行内部关系的理解，五行与现实政治、生活之间的对应关系的认识都存在鲜明的差异，因此，《顺逆》篇对这些学说的整合往往显得十分牵强。特别是《顺逆》在援据《相生》《相胜》所建立的五行对应体系时删去了具有基础性地位的“五官”一环，直接导致《顺逆》篇的五行体系存在无法自足的逻辑缺陷。但是，这种尝试融合多种五行

① 彭林：《〈周礼〉主体思想与成书年代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6 页。

② 焦循：《孟子正义》卷二一，中华书局 1987 年版，第 675 页。

③④⑥⑨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369, 367, 372, 373, 373 页。

⑤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 364 页。此处中华本标点有误，故不从之。

⑦ 表格中《洪范五行传》引文均出自《汉书·五行志》，下不复注。

⑧ 《汉书·五行志》，第 1320 页。

学说汇为一种新体系的努力,仍值得注意。

四 古本《治顺五行》与《五行顺逆》之关系

关于《治水五行》篇,学者已注意到其与《淮南子·天文训》的相似性,并据此质疑《治水五行》为晚出之作。但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隋人萧吉在《五行大义》一书中曾完整征引此篇,然其题名作“治顺五行”,似较今本作“治水五行”者更为合理。至于文本层面,则《五行大义》所引古本较今本更为完整、系统,今本中一些错简文字,通过古本可得到校正。关于这一问题,笔者有专文讨论,此不赘述。简言之,今本《治水五行》实经过后人删改,与其原始面貌相去甚远,故本文讨论其真伪问题,一依《五行大义》所引古本。

《治顺五行》(下文简称《治顺》)篇在结构上包括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理论基础,将一年分为五时,每时七十二日,分别以五行主五时。这种时令说又见于《淮南子·天文训》,唯《天文训》以“甲子”“丙子”“戊子”“庚子”“壬子”为受制之时,五子相隔各七十二日,故有“七十二”之数。虽总成五时共计三百六十日,不足一年实际天数,但在《天文训》内部体系完足,可自成一说。至于《治顺》篇,则径以五行各主七十二日,则何以此数为七十二而非七十三或其他,实无法得到解释,故笔者相信,《治顺》篇的第一部分当系删略《天文训》或类似时令文献而成^①。

《治顺》篇第二部分是对五行所主五时施政要略的分述,以木用事部分为例:

木之用事,则行柔惠,进经术之士。至于立春,出轻系,去稽留,除桎梏,开闭阖,通障塞,存幼孤,矜寡独。无伐木,恩及草木,则朱草。若夫人君驰骋无度,沈湎纵恣,重徭役,夺民时,厚税敛,则民疾疹疹,患足疾。木伤败,则龙深藏,鲸鲵出而为祸^②。

由于自“恩及草木”而下之文皆为今本所未见,故此前学者讨论《治顺》,多仅关注其与《天文训》之互见关系。但今据古本而论,则其文自“进经术之士”而下,几乎无出《顺逆》篇范围者,两者之间的重合度,实远超《治顺》与《天文训》,这在其他四行用事部分同样得到确认。在目前所见的文献范围内,可以基本确定,古本《治顺》与《顺逆》之间一定存在传抄关系。

进一步而言,《顺逆》篇以刘向《传论》为基础,杂糅时月令禁忌与董子五行生胜理论,虽然诸说之间的矛盾难以尽掩,但其多源文本汇而为一的动态生成过程则是比较清晰的。而与之相比,古本《治顺》篇的文献来源显得十分单一,无论是自“出轻系”至“通障塞”部分与《淮南子·天文训》之间的互见关系,还是“若夫人君”至“厚税敛”部分与刘向《传论》之间的互见关系,都同时互见于《顺逆》篇,而《顺逆》篇与《天文训》、刘向《传论》之间的互见关系,则颇有《治顺》篇所不及者。简言之,《治顺》与其他文本之间的互见关系,似乎都是借助《顺逆》篇而实现的。因此,虽然理论上无法排除《顺逆》篇系援据古本《治顺》而进一步扩充的可能性,但从文本生成的一般规律来看,更合理的解释,应当是古本《治顺》实系据《顺逆》篇加以删略而成的衍生文献。与《顺逆》篇对刘向《传论》的改造一样,古本《治顺》对于《顺逆》的改造也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用“五行各主七十二日”说取代《顺逆》篇“土主季夏”说,试图构建更为均衡的五行政治学说。

至于《治乱五行》(下文简称《治乱》)篇,在文本上则几乎完全互见于《天文训》,其说不再循董子五行生胜说,而持五行杂相干说,这实际上是基于四时各有分属、不可相杂的传统时月令思想而产生的,又与五星相犯的传统星占学思想相关。因此,表现在《天文训》中,均使用“甲子干壬子”“壬子干甲子”这样的干支术语,体现出其与时令、星占之间的关联。而《治乱》篇基本照录《天文训》之文,却将其“甲子”等五子替换成五行,将其整个体系改为“火干木”“木干火”等五行之间的干犯,这同样体现出《治乱》篇作者融会诸家、扩充五行理论的尝试。由于该篇与《治顺五行》名义相对,且理论基础都取自《天文训》“壬午冬至甲子受制”至“冬雷其乡”一节,故此两篇宜出于一手,成篇时间当在《五行顺逆》形成之后。

^① 桂思卓亦持此观点,可参桂思卓著,朱腾译:《从编年史到经典:董仲舒的春秋诠释学》,第119页。

^② 萧吉撰,中村璋八校注:《五行大义校注》,东京:汲古书院1998年增订版,第77页。

五 《五行五事》篇的真伪及其思想

《五行五事》(下文简称《五事》)篇围绕对《尚书·洪范》篇的阐释而展开。它首先构建了“五行”与“五事”之间一一对应的灾异影响关系;继而以解经体例逐字逐句解释《洪范》“五事”部分的经文;最终又将其中四事、四行与四时相对应,并从正反两方面交代了四时施政的要领。这种灾异体系看似与《洪范五行传》非常接近,但也存在一些重要差异:

其一,两者在处理“五行”与“五事”之间的关系时有所不同。《五行传》中五行、五事、皇极具有相对独立的休咎灾应,“木不曲直”和“貌之不恭”的咎由完全不同。木行与貌事之间的联系,仅存在于《传》文将“貌之不恭”的生成原因归结为“金沴木”,也就是木气受到了侵扰。但《五事》篇提出“貌不肃敬,则木不曲直”,将五行直接定位为五事有失的灾应,与《五行传》表现出明显的差异。

其二,两者的具体灾应体系存在明显的差异。《五行传》构建了一个复杂的灾应体系,他不仅将《洪范》篇“庶征”部分的咎、罚、极等概念一一纳入灾应体系中,还增加了妖、孽、祸、嗣、眚、祥等多种灾应,涉及天气、物候、政治、社会、动物异常、疾病等多个方面,极为复杂。但《五事》篇建构的灾应体系则简单得多,不仅灾应局限在天气这一范畴之内,而且具体的灾应与《五行传》也完全不同:

表5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与《洪范五行传》关于“五事”灾异之差异表

| 五事之失 | 《五行五事》 | 《洪范五行传》 |
|-------------|--------|---------|
| 貌之不恭 | 夏多暴风 | 恒雨 |
| 言之不从 | 秋多霹雳 | 恒阳 |
| 视之不明 | 秋多电 | 恒典 |
| 听之不聪 | 春夏多暴雨 | 恒寒 |
| 思之不容(思心之不睿) | 秋多雷 | 恒风 |

其三,两者的理论结构及论证方式也存在重要差异。《五行传》将五行、五事、皇极与具体的灾应直接对接,并不旁涉其他问题;而《五事》篇在对《洪范·五事》进行了精细的解释之后,提出了一套四时施政理论,将肃(貌)、义(言)、知(视)、谋(听)四种从“四事”中提炼出的德行作为理论基础,分别与四时相对应,再通过“春阳气微”“秋气始杀”等阴阳理论,说明四时施政的基本要求,并列举违时施政将造成的灾应。这种将阴阳、四时与五行、五事理论高度融合的做法,为《五行传》所未见。

由此可见,除五行与五事的对应关系保持不变以外,《五事》篇无论是在灾应体系,还是在思想结构方面,都与《五行传》表现出本质差异。相较而言,《五行传》的思想与《洪范》本文更为密切,在思想来源上也相对单纯;而《五事》篇无论是灾应设计,还是五行、五事之关系的定位,均与《洪范》本经之间显得疏远,其思想来源相对驳杂。因此,就《五行传》与《五事》篇之间的关系而言,前者应为直接源出《尚书·洪范》的传文,后者则类似在《五行传》基础上进一步吸收其他思想而形成的衍生文献。而无论我们的推定是否可以成立,可以确定的是,除了同样体现于《五行传》中的“五行”“五事”灾应思想以外,《五事》篇显然还有其他的思想内涵。认清这些内涵,是我们认识《五事》篇形成过程的关键。

首先是《管子·四时》篇所见关于四时施政要领的论述:

表6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与《管子·四时》之互见关系表

| 《五行五事》 | 《管子·四时》 ^① |
|--------------------------|------------------------|
| 春行秋政,则草木雕;行冬政,则雪;行夏政,则杀。 | 春行冬政,则雕;行秋政,则霜;行夏政,则欲。 |
| 秋行春政,则华;行夏政,则乔;行冬政,则落。 | 秋行春政,则荣;行夏政,则水;行冬政,则耗。 |
| 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 | 夏行春政,则风;行秋政,则水;行冬政,则落。 |
| 冬行春政,则蒸;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 | 冬行春政,则泄;行夏政,则雷;行秋政,则旱。 |

由上表可见,两者在结构上完全一致,在具体的灾应描述上虽然存在差异,但基本相应。此外,

① 表格中《管子》引文均出自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下不复注。

《五事》篇在论述四时施政时,还使用了所谓的“贼气”说:“于时阴气为贼,故王者钦钦,不以议阴事。”“于时寒为贼,故王者辅以赏赐之事。”^①而这种说法同样见于《管子·四时》篇:“是故春雕、秋荣、冬雷、夏有霜雪,此皆气之贼也。刑德易节失次,则贼气遯至,则国多灾殃。”^②

当然,先秦文献之间的传抄关系颇为复杂,《五事》篇虽与《四时》颇为类似,但未必直接录自《四时》篇,也可能两者另有同样的文献来源^③。但可以确认的是,《五事》篇关于违时施政之灾的叙述以及“贼气”之说均另有所据。

其次,则是《淮南子·时则训》篇关于十二月失政的论述。《五事》篇在论述“违时施政”的灾应之后,又进一步补充了“当时失政”的后果:

表7 《春秋繁露·五行五事》与《淮南子·时则训》之互见关系表

| 《五行五事》 | 《淮南子·时则训》 ^④ |
|----------------------|--|
| 春失政则(卢注:下有阙文)。 | 故正月失政,七月凉风不至;二月失政,八月雷不藏;三月失政,九月不下霜。 |
| 秋失政,则春大风不解,雷不发声。 | 七月失政,正月大寒不解;八月失政,二月雷不发;九月失政,三月春风不济。 |
| 夏失政,则冬不冻冰,五谷不藏,大寒不解。 | 四月失政,十月不冻;五月失政,十一月蛰虫冬出其乡;六月失政,十二月草木不脱。 |
| 冬失政,则夏草木不实、霜、五谷疾枯。 | 十月失政,四月草木不实;十一月失政,五月下雹霜;十二月失政,六月五谷疾狂。 |

比较“违时施政”与“当时失政”,前者是指在某一时节施行其他时节的政令,而后者则是指在某一时节没有施行当时应当施行的政令,类似现代政治学上所谓的“不作为”。与违时施政导致的灾异发生在当季不同,《五事》篇认为当时失政虽然不会实时导致灾异,但最终仍会在半年之后体现出来。这种理论模式颇具个性和创意,在先秦时期的月令文献中似未见到,但在《五事》篇内部乃至整个《春秋繁露》一书中,却没有对这种灾应体系的理论阐释,就笔者所见,系统的解释似仅见于《淮南子·时则训》:

六合:孟春与孟秋为合,仲春与仲秋为合,季春与季秋为合,孟夏与孟冬为合,仲夏与仲冬为合,季夏与季冬为合。孟春始赢,孟秋始缩,仲春始出,仲秋始内,季春大出,季秋大内,孟夏始缓,孟冬始急,仲夏至修,仲冬至短,季夏德毕,季冬刑毕。故正月失政……^⑤

据《时则训》之说,阴阳之气虽然在四时表现出不同的运动形态,但其存在于宇宙之中的总量以及自身的活动规律却是守恒不变的,因此,如果不能在四时适时地引导阴阳之气出入赢缩,则当时的失政便会导致异时灾异的发生。例如,若正月的时候没有及时将阳气释放出来,而是到了二月或三月的时候始将阳气释放,那么,到了七月,阳气自然就不会按照常规逐渐收缩入地,而是仍然滞留在外,这当然会导致七月的气候较常年温和,故此“凉风不至”。相反,若在七月之时,阴气仍然没有开始收缩,那么,到了次年正月,阴气也就不会按常规完全入地,导致气候较常年寒冷,出现“大寒不解”的“倒春寒”现象。由此看来,在宇宙间阴阳气守恒的理论框架之下,这种“当时失政”而导致“异时灾异”的说法是可以成立的,但显然需要类似《时则训》这样比较充分的阐释才能使人理解。《五事》篇在缺少任何理论基础的情况下径直抛出“当时失政”说,不得不令人怀疑这篇文献的原创性。

事实上,将《五事》篇的相关论述与《时则训》相比,我们发现,《五事》篇所列的四时失政之灾,正是对《时则训》十二月失政之灾的重新概括:由于《时则训》使用的是十二月体系,而《五事》使用的是四时体系,因此,《时则训》中分于三个月的灾异在《五事》篇中被归于一时之下,这种变更在“冬失政”部分看得最为清晰:“夏草木不实、霜、五谷疾枯。”正分别对应于《时则训》中的四、五、六月。至于“秋失政”

①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393页。中华本此句标点为“故王者钦。钦不以议阴事”,钟肇鹏整理本同。笔者以为“钦钦”当连读,《毛诗·鼓钟》:“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盘同音。”《毛传》:“钦钦,言使人乐进也。”《尔雅》:“钦钦,忧也。”《三国志·朱然传》:“然长不盈七尺,气候分明,内行修洁,其所文采,惟施军器,余皆质素。终日钦钦,常在战场,临急胆定,尤过绝人。”故“钦钦”又有刚正之义。“于时阴气为贼,王者钦钦,不以议阴事,然后万物遂生,而木可曲直也”,意谓于时阴气为贼害,然王者刚正好阳,不议刑杀之事,故万物遂生,木可曲直也。

② 黎翔凤:《管子校注》卷一四《四时》,第855页。

③ 关于违时施政之灾应的叙述,又见于《管子·幼官》及《淮南子·时则训》,文辞略有不同。相较而言,《四时》篇与《五事》篇似更接近。

④ 表格中《淮南子》引文均出自何宁:《淮南子集释》(中华书局1998年版),下不复注。

⑤ 何宁:《淮南子集释》卷五《时则训》,第437页。

部分的“大风不解”，似乎应是《时则训》“正月大寒不解”之讹误，“夏失政，则冬不冻冰，五谷不藏，大寒不解”的“大寒不解”四字，亦恐是衍文或错简所致：“大寒”者，冬寒也，初春大寒不解乃是灾异，但冬日“大寒不解”，则是正常时令，若以此为灾，则岂不与前文“冬不冻冰”相矛盾？

总之，今本《五事》篇中这些关于当时失政的灾应列举，大多可参考《淮南子·时则训》进行校补，而与《时则训》对于异时灾异现象完备的理论阐释相比，《五事》篇的灾应说显得十分突兀，令人费解。我们认为，《五事》篇的这段论述恐是以《时则训》为基础改造而成的，是将原有的十二月失政说改造为与《五事》篇自身结构相适应的四时失政说。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与《顺逆》一样，《五事》篇呈现出强烈的“文本嫁接”的色彩，它的理论框架借自《洪范五行传》，但无论是在对五行、五事之间关系的具体处理上，还是将“四事”与“四时”结合起来，论述“违时施政”与“当时失政”的灾应，都与《洪范五行传》呈现出本质性的差异，却与《春秋繁露》中反复强调的“四时”思想结合起来。可见，与《顺逆》篇一样，《五事》虽然在文献来源上颇为驳杂，但是其整合诸家异说，并努力使之适应董仲舒思想体系的倾向，实颇为显目。

不过，鱼目混珠，终究难具珠玉之光。《五事》篇虽然与董仲舒的思想存在相合之处，但是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也可以基本确认，它并非出于董氏之手。这一方面因为它在“嫁接”《洪范》《时则训》等文献时所显露出的粗糙与疏漏；另一方面也在于这篇文献所特别强调的“依时施政”思想与董仲舒本人的政治思想之间存在的差异。董氏固然非常注重传统的四时学说，但他更关注的是四时思想所呈现出的抽象的理论框架。他在《如天之为》篇中明确指出：“若留德而待春夏，留刑而待秋冬也，此有顺四时之名，实逆于天地之经。”^①由此，董仲舒对古老的四时思想做了新的阐发。但《五事》篇中反复论述的“违时施政”和“当时失政”，显然只是复述传统的四时思想，具有鲜明的农政色彩，与董氏思想并不一致。

六 从《孝经解》到《五行对》与《五行之义》

《五行对》开篇即介绍了其形成背景：

河间献王问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地之义。’何谓也？”^②

董氏为了说明孝为“天之经”，乃取四时、五行之说为据，认为天以五时相承、五行相生，正若父子相继之理，故“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又为了说明孝为“地之经”，乃先后举“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与“五行莫贵于土，土之于四时无所命者，不与火分功名”之说，论土地亦具孝之义。

由于此文有明确的撰述背景，因此其真实性似乎从未受到质疑，是《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篇以外最受认可的董子原作。唯清儒俞樾认为董生既以“勤劳在地，名一归于天”解释“地之义”，则无由复以土、火之关系再说“地之义”。故此认为自“土者，火之子”以下八十二字乃《五行之义》篇孱入者。对此，苏舆并不认同，他认为“俞说非。若以此入《五行之义》篇，于文为复。此自取五行之土说地耳”^③。

确如苏舆所论，今本《五行之义》篇已经有关于土、火关系的论述，《五行对》中的这段论述在《五行之义》中并无安身之处，俞氏“脱简”之说难以令人信服。但另一方面，俞氏提出的疑问确实也不容忽视，《五行对》的论述除了他所提出的这一点外，还有两点可疑。第一，该文在论孝为“天之经”时，以“土”主“季夏”，但在论孝为“地之义”时，又将“土”抽离出四时之外，认为其“于四时无所命者”。前后异说，令人生疑。第二，从《五行对》关于土、火关系的论述中可知，作者将“五行”中的“土”理解为“天地”关系中的“地”，但事实上，传统的五行理论认为木、火、土、金、水皆为“地”之所生，如《汉书·律历志》引传曰：“天有三辰，地有五行。”“土”与“地”在五行理论中并不能简单互换。

不过，由于缺少直接的文献依据，《五行对》的这些疑窦也只能被视为汉人说经随文见义、时有疏阔之例。但在林秀一先生据京都古棗堂文库藏清原宣贤《孝经抄》《孝经秘抄》辑出的《孝经述议·三才篇》中，有一段刘炫征引“董仲舒《孝经解》”的材料：

董仲舒《孝经解》云：河间献王问于温城董君曰：“《孝经》曰：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何谓？”对曰：“天有五行，木火土金水是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为冬，金为秋，土为季夏，火为夏，木为春。春主生，

^{①②③}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463、314、317页。

夏主长,季夏主养,秋主收,冬主藏,藏,冬之所成也。是故父之所生,其子长之,父之所长,其子养之,父之所养,其子成子之。诸父所为,其子皆奉承而行之,不敢不致如父之意,尽为人之道。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故曰‘夫孝者,天之经也’,此之谓也。”王曰:“善哉!愿闻地之义。”对曰:“地出云为雨,起气为风。风雨者,地之所为,不敢有其功名,必上之于天命,若从天者,故曰‘天风天雨’也,莫曰‘地风地雨’也。勤劳在地,名归于天,非有至义,其孰行此?故下事上,如地事天也,此谓孝者,‘地之义也’。”王曰:“善哉!”^①

这段材料与《五行对》虽然有异文,但大体一致,似乎更可证《五行对》所录为董仲舒之语,但仔细比对两者,我们发现,《五行对》中令俞樾和我们感到疑惑的内容,即以土、火关系论孝之文,恰恰为《孝经述议》所引《孝经解》所不见。再进一步,从《孝经述议》引文看来,其所见文献题名为“孝经解”,可知在该文中,董仲舒只临时借用五行相生理论来说明“孝者,天之经也”,但到了《五行对》中,“五行”反客为主,变成了核心论题,似乎关于《孝经》的问对只是为了引出董仲舒的五行理论而已。因此,在《五行对》中,在“尽为人之道也”之后,有“故五行者,五行也”一句,将论述的核心定位在“五行”上,而在《孝经述议》所引《孝经解》中,“尽为人之道也”之后即直承“由此观之,父授之,子受之,乃天之道也”,今细绎文意,显然“由此观之”前当论父子相继之事,“故五行者,五行也”一句在前文既无铺垫,与“由此观之”也不构成因果关系,当为好事者后加之辞。《孝经述议》所引《孝经解》才更接近董生对河间献王之言的原貌。

这样看来,《五行对》虽然确实基于河间献王与董仲舒问对《孝经》这一史实,但该文作者偷梁换柱,将以说解《孝经》为主的一篇文章转变成了以说解“五行”为主旨的文献:首先,作者将文献题名定为“五行对”,确立了“五行”核心论题的地位;其次,在以“五行”论“孝者天之经”的过程中,插入“故五行者,五行也”一句,用一个“故”字,将前面所有论述的立足点再次确定到“五行”上;复次,在论述“孝者地之义”的部分,董仲舒原本并未言及五行,但该作者既然要以“五行”为核心,遂从土、火关系入手,以“土王四时”说重新解释了“孝者地之义”,最终构造出一篇新的五行学文献。

循此再看《五行之义》,我们发现,该文与《五行对》之间存在明确的互文关系,其开篇“天有五行”云云,即直接取自《五行对》中董氏对文,其后除论五行方位、以阴阳论五行养生丧死之道以外,大抵皆缘《五行对》中董氏之说而成,至如“故五行者,乃孝子忠臣之行也。五行之为言也,犹五行欤”句,几乎就是对《五行对》中“故五行者,五行也”一句的具体解释。不过,与《五行对》中此句突兀难解不同,在《五行之义》中,作者明确将“五行”之“行”与“孝子忠臣之行”,也就是前文所讲的“火乐木而养以阳,水克金而丧以阴,土之事火竭其忠”这些“德行”联系起来,故“五行之为言”的“五行”,指作为专有名词的“五行”,而“犹五行欤”的“五行”,则为“五种德行”之省文,前后文之逻辑关系非常清楚。此后,《五行之义》又论五行居五方而各有所主,故“官人必以其能”,这是《五行对》所未言的。至结尾部分论“土”之“忠”德,则又与《五行对》中以“土”“火”关系论“忠孝”的思路基本一致。

这种文本层面的互文性以及更为深层的逻辑对应关系显示出《五行之义》与《五行对》之间的衍生关系——《五行之义》去掉了《五行对》中关于《孝经》的问答框架,将“五行”彻底变成论述的核心,而《五行对》中提及的“天”“地”(在《五行之义》中被完全替换为“土”)以及孝养等概念,则完全成为阐释“五行之义”的工具。我们认为,这是对《五行对》的进一步改造。两个文本之间的关系与前文所论《五行顺逆》篇与《治顺五行》之间的关系颇为相似。

从见于刘炫《孝经述议》的《孝经解》佚文,到《五行对》,再到《五行之义》,我们看到,一篇局部借助五行理论解说《孝经》的文献,最终被彻底改头换面,变成了一部借助天、地、孝养等《孝经》学思想解说五行之义的文献。文本的主体结构似乎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但文章的主旨却悄然间实现了反转。

七 文本嫁接:《春秋繁露》“五行”诸篇生成研究的文本学意义

《春秋繁露》与“五行”相关之文献共九篇,按主题可以分为三组:第一组即《五行相生》《五行相胜》,以“五行”生胜关系构建国家治理的官僚制度;第二组则是《五行顺逆》《治顺(水)五行》《治乱五

^① 林秀一:《关于〈孝经述议〉复原之研究》(《孝经述议复原に关する研究》),东京:文求堂书店1953年版,第255页。

行》《五行变救》《五行五事》，通过呈现“五行”内部的多重关系及其与四时之间的对应关系，阐述“依时施政”的政治理念；第三组为《五行对》《五行之义》，由《孝经》论及“五行”“父子相生”等义理，阐发“孝子忠臣之行”的必要性。

从文本生成的层面而言，除《五行变救》篇尚缺乏足够的资料暂无法考定外，其他八篇文献可以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可视为董子原作，包括《五行相生》和《五行相胜》。第二层为后儒援据他学，尝试使之与董子五行生胜理论相合者，包括《五行顺逆》《五行五事》《五行对》。第三层为更晚之儒生据上述第二层文献再次编纂，欲使董子五行生胜理论更臻完备者，包括据《五行顺逆》而作的《治顺（水）五行》《治乱五行》以及据《五行对》而作的《五行之义》。

这些二、三层次的文本多受到包括《洪范五行传》、刘向《洪范五行传论》在内的《洪范》五行学文献以及秦汉时期流传的各类五行时月令文献的影响，另一方面又颇服膺董仲舒《五行相生》《五行相胜》篇所论五行生胜说，因此尝试将此三种“五行”理论整合为一种新的“五行”政治学说，反映了五行学发展到成熟阶段时出现的社会思潮。但是，《洪范》五行学、董氏五行生胜理论与时月令文献虽然均与“五行”相关，但他们的思想立场、对“五行”本质的认识以及对“五行”内部关系的处理都存在重要的差异，以《顺逆》为代表的这批作品虽然在表层结构上尝试将三种“五行”学文献“嫁接”为一体，但并没有在理论层面上真正实现三种“五行”说的融会贯通。举例而言，传统的时月令文献强调依“时”立政，将五行与四时或五时、十二月分别对应，用木主春生、火主夏养、金主秋收、水主冬藏的农事观念来建构四时、十二月的施政要理，具有强烈的“农政”色彩，但汉儒的《洪范五行传》则具有“去月令化”的思想倾向，五行所主政事与时令之间的传统对应关系被淡化甚至消解，而董仲舒的“五行”思想虽然与月令相关，但他明确反对绝对的“时令”说，强调德、刑之施行不必径依四时变化，凡此均体现出汉儒五行理论尝试摆脱月令“农政”色彩的努力。因此，将此三家之说强行合为一体，不但无助于实现五行学的整合，还会造成五行学内部的体系混乱。《顺逆》诸篇的作者进行了一次并不成功的尝试，但这一尝试对于我们进一步认识《洪范》五行学、董仲舒五行思想以及时月令五行学说各自的思想个性，仍起到了某种促进作用。

此外，通过对《春秋繁露》“五行”诸篇形成过程的分析，我们对抄本时代文本形成的复杂性也有了充分的认识。在早期中国的著述传统中，“抄”本身也可能成为一种再创作的方式：《顺逆》之于刘向《洪范五行传论》，《治顺》《治乱》之于《淮南子·天文训》，《五行对》之于董仲舒《孝经解》，都可视为一种“抄”，但在“抄”的过程中，文本的核心立意可以发生反转，思想系统可以不断调整，具体事例更可以不断增删替换，最终形成的新文本与其抄录的对象之间虽然存在大量互见甚至完全一致的文本，但这些文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文本系统。它们有的进一步进入新文本的深层结构，成为建构新文本内在逻辑的基本要素；有的则始终无法融入新文本的深层结构，只能“貌合神离”地兀立于新文本之中，成为“文本嫁接”过程中留下的“伤疤”；还有的则带着原有文本的思想背景，阻止新文本自身逻辑体系的构建，在新、旧文本之间形成一种理解的张力，呈现出一个混乱而失序的文本结构。这种类似于“嫁接”的文本形成过程，在《韩诗外传》《史记》《汉书》《新语》《说苑》乃至唐人《毛诗正义》《春秋左传正义》等文献中都有不同程度的体现。换言之，早期文本之间的“互文性”，揭示出文本群体之间的传抄关系，展现了一种具有公共性的知识资源；而文本之间的“异文”，则展现出这一文本的生成者个性化的知识处理方式。“互文”与“异文”的出现，不仅仅具有传统校勘学或者辑佚学层面的价值，更揭示出这些文本的复杂形成过程，对于我们深入认识他们叙事风格、思想意义、学术立场的形成，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值得我们在研究中加以关注^①。

（下转第 73 页）

^① 关于写抄本时代文本传抄关系的复杂性，可参拙文：《写抄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6年第2期，第148页。

Political Mentality about Constitutional Reform among Young Royal Elites in the Ending Qing Dynasty

Sun Yanjing

Abstract: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constitutionalism movement had grand and ambitious design. Among those political groups who were in favor of reforming and constitutionalism, there were many young imperial relatives who were fond of new things, having an open mindset and radical behavior and daring to take challenges. They enrolled competent people and even worked with revolutionary parties. They wanted the movement to be carried out as quickly as possible, and dreamed to build a powerful country in only several years. But this is a very risky step considering the collapsing country, anxious whole nation people and an absence of great figur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20th century, though their intention and position were totally different with those progressive youth, the democratic trend and modernity thinking have an influence on these young imperial people, but their eyesight is only limited to the direct feeling of what a powerful modern country is. Of the same age with students abroad, they had lots of commonality—being eager to embrace new things and new thinking, getting anxious easily in difficulty, anxiety leading to fickleness and fickleness leading to radical actions. Their thinking, a mirror of their pursue of modernity, has broken through the old political hedge which is arbitrary and conventional. While advocating righteousness in public they always sneaked for their own benefit. These weakness at the core of them and their political immaturity leads to a total defeat ultimately.

Keywords: the constitutionalism move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 young imperial relatives; political psychology

【责任编辑 郭常英 责任编辑 张秀丽】

(上接第 40 页)

收稿日期 2015-05-04

作者程苏东,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讲师。北京,100871。

New Evidences about Writing of Five Elements Articles in *Chunqiu fanlu*

Cheng Sudong

Abstract:In the nine articles involving Five Elements in *Chunqiu fanlu*, except the two articles *Wuxingxiangsheng* and *Wuxingxiangsheng* were certainly produced by Dong Zhongshu, the author of *Wuxingbianshu* is clear, the other six articles were more or less related to *Guanzi Sishi*, *Huainanzi Shizexun*, *Huainanzi Tianwenxun*, and Dong Zhongshu's *Xiaojingjie*, Liu Xiang's *Hongfanwuxingzhuanlun*. In comparison it is found out that seven articles in *Chunqiu fanlu* include Dong Zhongshu's own works, sequels and even again reproductions by later generations. It demonstrates an attempt by later confucians to integrating Dong Zhongshu's idea about Five Elements rotation, thoughts of season changes in the Qin-Han times, Five Elements doctrine in *Hongfan* and even thinkings in *Xiaojing*. It aimed at creating a new Five Element system. Those derivational texts had various sources, had contradiction in logics. It is a typical text grafting in traditional writings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notice.

Keywords: *Chunqiu fanlu*; Dong Zhongshu; Five Elements; *Hongfanwuxingzhuanlun*; Liu Xiang

【责任编辑 徐莹】